

柯保安 著
(Paul A. Cohen)

古偉瀛校訂

李榮泰等譯

美國的
中國近代史
研究

回顧與前瞻

柯保安 (Paul A. Cohen) 著

李榮泰等譯・古偉瀛校訂

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回顧與前瞻

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回顧與前瞻

· 61037 ·
80. 3. 1161

中華民國八十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第二次印行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R.O.C.

定價：新臺幣280元

著者 Paul A. Cohe
譯者 李榮秦等
校訂者 古偉瀛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3620137·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562-5 (平裝)

譯序

柯保安教授(Paul A. Cohen)此書問世以來，不論是中英文書評或介紹，均廣加讚揚。此書深入討論並批判了近數十年來美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成果，不但能使我們知道美國多年來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情形，更使我們知道這些研究所採取的幾種主要解釋架構及其背後的假設、缺點，作者在最後並提出一種較好的研究途徑，為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提高了層次。

在臺灣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雖然有不少機構及個人在努力推動，但是或由於語言的隔閡、交流之不便等因素，並未能充分善用外人的研究成果。而在二次大戰後美國為了解中國，投注了大批人力物力財力鼓勵對中國的研究，其中近現代史部分，研究的人最多，在資料、社會科學理論及方法上均有值得借鏡之處，然而，這些研究成果分散各處，不易集中，今柯氏此書，綜論此方面之研究，為我們省了不少時間及精力。

民國七十四年筆者在臺大歷史系所擔任中國近代史英文論著專題研究課程，正值此書出版未久，遂在課堂上與同學共同研讀此書，字斟句酌，認真討論，務期把握全書精義，以做為進一步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之基礎，數月之後即已讀完，復承聯經公司錢永祥及方清河先生鼓勵譯出，乃請同學分別執筆，計有李榮泰、平雲、邱澎生、許瑞浩、張麗芬、鍾淑敏、鍾月岑、游紫玲、吳翎君、金鴻文、沈忠憲等先生小姐，最後復請李榮泰先生全部修改潤筆一次，再由筆者從頭至尾細心校訂，相信已能充分了解作者的意思。

雖然我們確信已掌握住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然而此書本是寫給西方人看的，爲了更使此地讀者能接受起見，我們在某些地方稍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例如：多加一些引號，避免因西文之表達造成意思之難解等），偶而還加譯註。當然，書中的見解並不代表譯校者的觀點，只是想忠實反映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

書中外國學者中文譯名的問題我們採取的原則如下：如該學者有吾人得知的中文名字，則用此名；如果沒有，則以其音譯出之，例如：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史景遷 (Jonathan Spence)、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ère)；在譯文中，人名首次出現時附以原文全名，其後則往往以其中文姓氏稱呼，但若文中相隔太遠，再度出現時仍附英文，以資對照。在註釋中，有進一步討論的情形時，我們則加上譯名，否則只以原文出現，以免混淆。總之，一切以便利讀者檢索爲上。

本書末章曾由柯氏以中文在大陸發表過，然該文係節譯，且用字遣詞與此地不盡相同，本譯文比該文更完整而正確忠實地呈現原著的風貌。

在中國歷史中，玄奘及馮承鈞的翻譯是廣受肯定的，而且其貢獻非凡。在當今學術界，翻譯卻未受到應有的鼓勵，所以，有

些學者寧願以各種辦法取巧，利用別人的研究當成自己的創作。流風所及，翻譯的水準也參差不齊。本書之譯，是希望能介紹外人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成果，並肯定翻譯之價值及嚴謹風格的重要性。

正如本書一開始所指出，學術研究的大敵是種族中心的偏見，學術的成熟在於跳出自我的狹窄眼光，努力去以同情地了解來認識這個世界，筆者也希望此書之譯，除了知識上的獲益，也有助於心胸之開拓，並以感謝及欽佩的態度去了解美國學者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專業精神。譯書之不易，惟有當事者最能體會，而我們即是懷著上述的心願，面對各種挑戰慎重而興奮地執筆的。最後，並願藉此機會感謝所有關心並協助完成此書翻譯的人。

古偉瀛 七十五年深秋
臺大歷史系

1985.10.10

前言

不是史學家的人，有時認為歷史是有關過去的事實。史學家的認識則應該與此有所不同。歷史中確有事實，但是它們在數量上是無窮盡的，而且如果這些事實真的會說話，它們的語言也是互相矛盾，甚至常常無法了解。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回到這個由歷史事實所構成的混亂而無頭緒的世界中，選取其中重要者，討究它們在說什麼。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儘管我們有史學方法來幫助我們誠實，但是強烈的主觀成分，必然滲入所有史學著作。我們選取什麼事實，以及對這些事實賦予什麼意義，都受到我們提出的問題以及所據以從事研究的假設之深刻影響；這些問題和假設，又反映了在當下我們心中最主要的關懷。時光流轉和關懷之事改變，反映這二者的問題和假設也隨之而變。因此，人們常說，每一代的史學家都必須重寫上一代寫過的歷史。

然而世代是一個曖昧的概念。從羣體的角度而言，每一位史學家都屬於一個特殊的世代羣體 (generational cohort)，而且在史學界中有一種傾向，將世代羣體（例如一九五〇年代在哈佛受

費正清調教的學者），與一個研究領域演變過程中的特殊研究方法或階段（如中國史研究中的「哈佛學派」），聯結併論。可是，從個體的角度而言，所有史學家在他們創作的一生中，都經歷一連串的世代變遷。我們所屬的世代羣體是一種很大的力量，對我們的思想活動能力施加了很實在的限制。但這些限制是局部而非絕對的。舉一端以言之，個人從一開始就彼此相異。年齡相同、在同樣期間受同一老師調教出來的人，儘管共有某些假設，但互相之間決不會一模一樣。的確，只要仔細閱讀本書，就可以充分證實，他們在史學的研究取向上會有絕大差異。再就一事而言，我們在生理和心理方面日漸成長，而且所生活的世界不斷改變（有時改變相當劇烈），我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內在和外在此變遷的影響，即使是有性格頑強保守而其基本假定似乎最不受波及的人，也不例外。

這兩種以世代為著眼點的觀點——即標示一門學科發展的羣體面，以及史學家針對周遭（以及內在）的變遷做反應而經歷的個人面——都反映在本書之中。本書是針對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籠罩美國學界中國近代史著作的一些主要研究方法，做一批判性的評估。我所謂的「近代」（recent），廣義上，是指十九和二十世紀，就是通常所指的 modern 時期。基於以下即將表明的一些原因，我一直很不喜歡 modern 一詞應用到中國史上，即使是純粹為了稱呼方便，也不想用。我寧可使用「近代」或「一八〇〇年以後」之類名稱。然而，就像本書討論到的作者有不少人本身就將中國史區分成現代和傳統（或現代之前）兩個部分，我也了解，要完全避免這個字眼，是不可能的。

本書除了對美國的中國史論著做一番探究之外（因此也直接牽涉到架構更廣的中美關係的思想層面），還標示了一個史學家心路歷程的一個轉捩點。我四十歲不久，就決定要寫這本書。這個決定，是我多年來一直想要解決的一些思想難題的直接結果。這些問題，部分源於個人因素，部分則為歷史因素。我的第一本著作《中國與基督教》（*China and Christianity*）出版時，我才剛步上教書生涯，關心之事，出於個人與職業者多，屬於思想者少。這本書發軔於我研究所第三年（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一篇討論會論文，此後，直到一九六三年付梓成書，世界上大致並無驚天動地之事發生——至少，沒有什麼事情搖撼我自己那片小天地。由於沒有受到外來挑戰，因此成書之時，我的假設多多少少就與當初執筆之日相同。由於我並非出身學院環境，而且不十分相信寫書的人也是真真實實的人，因此我最關切的，是要向自己證明，我的確能作個歷史學家。而基本上，我當時是以為，能寫出合乎史學界技巧水準的學術著作，就是歷史學家。

一九七四年，第二部作品《傳統與現代之間》（*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問世。我更加確信自己是史學家了，而且覺得這本書寫得不錯，至少技術上比第一本好。但是我耽心它是否「確當」（right）。我所謂確當，指全書的思想設計達到內在的連貫，以及所用的假設能够成立。我埋首於這第二本書的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三年間，美國擾攘多事，不同於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三年。越南、高棉、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有關成長極限的報告，以及水門事件，對我們這一代的影響，就如經濟大恐慌對上代的影響。然而，二者間亦有不同。經濟大恐慌

的年代，激起大家深深關心美國財富如何分配與美國社會如何建構，而一九六〇年代到七〇年代初期的一連串危機，則凸顯美國科技的破壞力，與控制其使用權的美國人的道德曖昧之間有其矛盾，而提出了所謂「現代」歷史發展過程的問題。經歷越戰之後，再也不可能輕易假設美國的力量是善良的力量，再也不能輕易為「現代」與「文明」畫上等號。

《傳統與現代之間》談的是中國的改革家王韜。十九世紀下半葉，他跨處於中西兩種文化之間，廣泛地思考和論述中西接觸的問題。我試圖去了解王韜時，面臨的問題是：著手此書時所持有關「中國」、「西方」、「現代」和「傳統」的想法，在全書所費十年中，曾發生嚴重滯礙。我覺察到這個困難，因此在書中多處討論「傳統——現代」兩極性所具的問題特質。我甚至曾經起意將書名定為「超越」（beyond）傳統與現代，而不用傳統與現代「之間」（between）。但是最後，王韜可能已經「超越」（beyond）了，我則依然困處其「間」。我的思考往一個方向推，但概念的框子把我往另一方向拉，因此全書思想架構明顯地呈現一種緊張關係。

在完成有關王韜這部書並獲得一些長進之後，內心不安也到達一個嚴重的關頭。這時我了解到，對待它的唯一方法，就是直接面對幾個籠罩一切的思想架構或典範。這些架構或典範似乎一直支配了戰後美國有關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史的研究。（下面很快就會提到，早在一九七〇年我就已經朝著這個方向做了初步努力。）這種直接面對問題的動機，雖然不能不有強烈的個人成分在內，但是我希望其所產生的最後結果也將對我的同行和學生有

用處。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之前，一直比較缺乏自我批判的史學研究著作。大約從那時起，一種比較具有批判性的觀點才逐漸發展起來，先是《關懷亞洲學者學報》(BCA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然後有一九七五年發刊的季刊《現代中國》(*Modern China*)。我歡迎這種批判性的觀點，而且覺得這有益於一個思考上變得過於昏沉不振的研究領域。然而，其中所提出的某些批評，我並非盡皆同意。而且，即使我想去贊同，我也常發覺，支持那些批評的經驗資料若非不足，就是斟酌欠周，或者過於簡化或偏頗，難以令人信服。一方面，我對這種新的批判觀點中的某些部分覺得心有未愜，另一方面，對那些批評者抨擊的對象，我也同樣不滿意，於是，內心交爭之餘，我立志提出我的史學研究縱覽，這縱覽即若不如目前所見批判之善於摧陷舊說，至少可望有助澄清其中牽涉的幾個核心問題。

本書細審許多朋友和同行的作品，但是沒有一位是我未曾獲益良多的。事實上，對他們之中幾位，尤其是我曾忝列門牆的費正清先生，以及相識未深但我遙相嚮往的李文遜先生(Joseph R. Levenson)，我都覺得思想上都惠我莫大。然而，在史學家獲人教益，有其獨特之處，因為我們並非單純機械地承襲一套知識，添加某些內容之後，就傳給下一代。對於環繞前輩作品的思想架構，我們還不時加以疑問、試驗、推搖，而且，這麼做的同時，十分清楚會有別人來大力動搖我們的著作：一言以蔽之，沒有史學家能坐享定論。

但批評是一回事，議論不公又是另一回事。我十分重視批評

欠公這回事，並且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一直很擔心自己會犯這種錯誤。我判斷時，力求持平，指出某人作品或某種整體取徑之缺陷時，也盡可能明確指出我的批評所根據的前提。不過，取他人著作，為我分析觀點之佐證，某種曲解勢必難免。這麼做，於人之觀念在時間裏的起伏，必定有所掛漏，而且容易忽略學者作品質地中的對位式發展主題及其修正之處，甚至一些為圖補救而造成的自相矛盾。因此，將費正清和李文遜描繪成一九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美國史學界主要研究方法的首要代表人物，我們很容易忘卻費正清在他超過五十年的職業生涯中，曾經以好幾種不同的角度探討中國，而且隨處察納前提與他不同的學術成就；而李文遜一九六九年悲劇性的猝死，使他無法對那時正在興起的新解釋潮流有所回應，但是，以他學而不倦而識力精微，他也不可能長久拘限於任何一種假設架構。

如果討論個人時無法達到絕對持平，那麼在相關主題的討論上，我就更不敢期望自己能達到這種境界。本書於題材處理之輕重厚薄，頗有揀擇——而有的人可能說我厚顏。全書多少比較偏重於十九世紀，因為如果我們要檢討「衝擊——反應」和「傳統——現代兩極」這兩個思想典範，這段時期是具有絕對關鍵性的。本書所包羅的學術著作，以及所探討的特殊主題和問題，也都同樣地具有選擇性，反映了一個，而非所有史學家心中最主要的思想關懷。我想我的某些同行會有相當不同的關切事項，如果他們也嘗試本書這種著述，必將大不相同。我希望他們能做這種嘗試。

本書四章雖然表現共同的主題，而且構成首尾一貫的整體，

但也同樣可以當作各自獨立、自成一體的論文來看。第二至四章是特別為本書而寫的。探討「衝擊——反應」典範的第一章，則是多年前發表過的一篇文章，依據最新資料，大幅改寫而來的①。第一章的寫作方式有點不同於其他各章，著重於將「衝擊——反應」之說與實際歷史例證互勘；而第二至四章則較為直接投注於美國史學家學術著作的分析。儘管我的原意並非如此，但寫成之後，第一章多少偏重於政治史、第二章偏重思想史、第三章偏重經濟史、而結尾的一章則偏重社會史。然而這只是就重點而論。例如，實際上每一章在某種程度上都處理到政治史的問題。

由於這本書的目標是要確認、並批判性地分析盛行於美國史學研究中的各種假設，因此，其他研究十九、二十世紀中國的史學研究傳統，諸如中國、日本、歐洲和蘇聯的傳統，大部分都不在討論之列。此舉絕非貶抑其他傳統裡的史學家（尤其中國和日本）對美國學術界的巨大影響。然而，這種影響已被美國人的關切和執著所過濾及調整。這種關切和執著究竟如何產生一種美國特有的史學研究，才是我研究旨趣所在。

此處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有必要先加以釐清。在支配任何歷史研究領域之進化的諸多因素中，史學家所生活和工作的政治、思想與文化氛圍，在我看來是居首的因素，餘皆次要。當然，若開發了新技術，語言訓練和能力有所增進，知識累積，以及獲得以往所不知或無從接觸的檔案或其他資料來源，所有史學領域都會經歷一番內在發展的過程。然而，這種內在發展是儘管一個研究領域成長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但並不能決定成長的方向和形

式。史學家所依循的研究方法、所提出的基本問題，主要仍將由史學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所塑造。同樣地，在其他各種史學研究傳統的潛在影響方面，比類影響在經驗資料、研究技巧，以及個別且明確界定的史學問題的探討上最為有力，而對整體研究概念的領域中，則可能最為微弱。馬克思主義史學支配下的日本和中國大陸史學家，比美國史學家早好多年就密切注意社會經濟的因果關係。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美國史學家的注意力終於轉移到這方面的時候，這反映出美國方面發生的重大轉變，但這在中國和日本已絲毫不是什麼新事。

本書大體與以上概觀一致，討論的史學著作的作者，絕大部分是美國人。然而有一項偶爾的例外。某些學者雖然本身不是美國人，但與美國學界深有淵源，他們定期參與學術會議，在美國史學期刊上發表文章，而且經常和美國史學家共同合作出版學術著作。這些作者，個人可能甚具創意，但我認為他們並不構成一個截然不同的史學研究傳統。另一例外稍有不同，是華裔美籍的史學家。論人數和影響力，這類史學家在美國的中國史學界都是重要成員。除了極少數例外，作品在本書中被討論到的此類作者，除了在美國任教，也曾在美國接受過他們全部或部分學術訓練，而且多半是以英文從事學術創作。因此，以美國史學研究的任何角度看，將他們納入本書討論，不僅恰當，而且必要。

最後，再以一兩句話交待一些技術性的問題。由於我認為本書不是對相關文獻的全盤評論，而是詮釋討論美國史學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的主要取向，因此我一直避免列出一篇書目。但是，完整的出版資料，都在每一章第一次引用該資料來源的註釋

中列出。漢字譯音方面，儘管越來越多有關中國的出版品已經改用拼音系統，但我在本書仍舊沿用 Wade-Giles 系統。理由很簡單，因為本書是討論其他著作的書，而這些著作絕大部分本身就採用比較老的 Wade-Gile 系統。本書不少直接引用這些著作的文字，如果我將自己的文章改用新系統，恐怕除了最在行的讀者，對其他人都將引起不必要的混淆。最在行的讀者，或許才不會把慈禧的兩種譯音 (Tzu-hsi 和 Cixi) 錯認成兩個不同的人。

本書所論主題的專家，數目等於熟知美國在十九、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方面的學術的人，因此，寫這本書的每一個步驟中，我都能倚重其他學者的建議和批評。這些學者中，我從高德曼 (Merle Goldman)、孔復禮 (Philip Kuhn)、李莉蓮 (Lillian Li)、黎安友 (Andrew Nathan)、白樂傑 (James Polachek)、蘭菁 (Mary Rankin)、羅司曼 (Henry Rosemont) 和薛立敦 (James Sheridan) 等人獲益最多，他們都曾特別仔細看過我的手稿，並且不辭辛勞，寫下長篇評語供我參考。我同樣要感謝伊凡士 (Paul Evans)、費正清、蒲地典子 (Noriko Kamachi)、區可 (Jonathan Ocko)、石約翰 (John Schrecker) 和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諸位先生在許多方面給我的建議和忠告。

當我在惠特曼學院 (Whitman College) 和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講演中提出第二章中的主要議題時，從聽眾所發問題和批評中獲益匪淺。另外，我在衛斯理 (Wellesley) 和哈佛 (Harvard) 的同事，以及參加一九八一年八月上海復旦大學「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討論會的與會人士，都對我的原稿作過有益的討論和批評。

我得感謝「國家人文獎助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 以及衛斯理學院在一九八〇到八一學年度給我的資助。我很高興終於有機會表達我對包德茜 (Dorothy Borg) 深深的感激，為的是她對一個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的支持，更難得的是其中同時有著親切的鼓勵、完備的建議，以及珍貴的工作協助。

最後，我想感謝我的子女們，並誠摯將本書獻給他們，這並不是為了什麼特別的緣故，只因為這些年來他們使我的生活更充實，更圓滿。

①：即“Ch'ing Chin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1850-1900”一文。收於 James B. Crowley 所編 *Modern East Asia: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70) pp. 29-61。

導論

研究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尤其是研究西方衝擊以後階段的學者，最大的問題一直是種族中心觀念所造成的扭曲。這種問題的來源之一是一項明顯的事實，即我們西方在中國近代史中，一直扮演著直接而且極具關鍵性的角色。另一較為不明顯的來源厥為中國人本身，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或非馬克思主義者，在重建他們自己歷史的時候，都一直相當依賴從西方引進的詞彙、概念和分析架構，因此使西方史學家無法獲取不同於局外人自身，但有必要加以參考的局內人觀點。直到最近，這類觀點曲解中國歷史的趨勢一直不斷，有的是誇大西方的角色，有的比較微妙，亦即誤解西方的角色。西方史學家所遇的重大挑戰，並不在於消除所有種族中心的曲解，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而是要將此類曲解降低到最少程度，這種可能實現的目標，並且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將我們（西方史學家）自己解脫出來，以新而且比較不以西方為中心的方式，來看中國史。

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的作品一直傾向於強調中國近代史中與西方有最直接關聯的部分，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事、